

[文章编号] 1003-4684(2023)06-0029-06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微

蔡 倩, 张永庆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存在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实践不仅是哲学概念, 还是政治经济学概念。实践的二重性是指市民社会条件下实践作用于感性世界发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实践二重性,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双重批判: 既批判人与“环境”之间关系上的感性世界“分裂”; 又批判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感性世界变为抽象的统治力量。实践二重性思想是劳动二重性理论的“萌芽”, 是理解《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枢纽”。它把此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推进到“新世界观”的高度, 并为此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确立了宽广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 市民社会; 实践二重性; 政治经济学批判; 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1]885}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 学界大多只是当作哲学著作解读。其中, 核心范畴实践几乎一例划定在哲学范围内讨论。该研究方式的突出问题是, 马克思自《德法年鉴》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主线被彻底的忽视。本文拟在探讨《提纲》实践概念的政治经济学涵义基础上, 梳理《提纲》中市民社会批判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 同时阐发由此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及其理论意义。

1 反思实践概念的思辨化解读

以哲学思辨片面理解《提纲》的实践概念可谓由来已久。囿于哲学思辨角度, 以知性的要素还原、结构主义的关系还原以及形式化的辩证还原等方式, 学界解读出林林总总的实践观点, 并据此做出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判断。有人认为实践高于物质, 故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有人认为实践是客观物质活动, 以此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 有人认为实践所决定社会关系提供了结构分析范式, 所以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人本主义的科学; 还有人认为, 实践是把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的思维方式, 是思考整个世界的历史原则, 所以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思维方式; 如此等等。在我们看来, 单纯以哲学

思辨片面理解实践, 难免偏离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这一根本议题, 产生多个认识误区。

其一, 过分抬高“第 1 条”的地位。以往哲学思辨方式研究, 过分抬高“第 1 条”在《提纲》中的地位, 把“第 1 条”与它之后的内容看作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看作是一般性原理在各个特殊问题上的应用。这会导致以“第 1 条”实践规定性的诠释生硬裁剪《提纲》关于实践的丰富、具体论述。在我们看来, 实践概念的叙述逻辑有其内在的过程, 从“第 1 条”提出实践, 到后来从环境与人的关系、市民社会与人的关系、人类或社会生活与人的关系规定实践的内容, 实践概念越来越具体, 越来越趋近现实本身。抽象看待实践在“第 1 条”与后续论述的一致性, 就是把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过程简单化为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如是哲学思辨, 必然遮蔽实践概念的具体性。

其二, 片面强调“第 1 条”中的哲学判断。对于“第 1 条”自身的哲学思辨方式研究, 也多是片面强调某一部分的表述, 对其他部分采取轻视甚至视之不见的态度。一个显著表现是, 一些研究者偏执于铺陈哲学史上的抽象问题, 沉溺纯粹思辨地追问“第 1 条”提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对立。实际上, “第 1 条”对实践的规定, 并非像流行的观点解释的那样, 把哲学史上抽象问题当作自己面对的思想靶心。在“第 1 条”中, 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

[收稿日期] 2022-09-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KS004)

[第一作者] 蔡 倩(1983-), 女, 湖北荆门人, 历史学硕士,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 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通信作者] 张永庆(1969-), 男, 吉林农安人, 哲学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理论。

心主义对立,首先不是作为单纯的理论问题来看待的,其出场方式取决于市民社会批判,因而属于意识形态论域。实践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有效批判需要置于革命的实践形式——共产主义来把握,即通过实践去批判具有“犹太人”商业本质的市民社会获得科学认识。可见,实践观点只是在派生意义上提供梳理哲学史叙事的功能。

其三,批判维度缺少现实性。以哲学思辨方式解释实践的批判维度,往往脱离现实根基。实践有改造世界和发展人自身的解放意义,所以必然具有批判维度。由于解放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中实现的,所以《提纲》不是抽象地议论实践的批判维度,而是通过深入批判市民社会论述共产主义实践带来的现实解放。对于实践概念的批判维度,以往的研究要么是不予理睬,要么是停留于表面联系,没有落实到市民社会批判特定语境中去揭示它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和共产主义革命方式。

其四,意识形态批判“缺席”。以往的哲学思辨方式研究没有注意到,与实践观点相呼应还存在一个意识形态批判逻辑。《提纲》对批判对象的叙述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是,意识形态所指称的现实生活与意识的分裂及颠倒现象,已经用《提纲》特定语言表达出来了。“第2条”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134},离开实践来讨论思维的真理性的则与“经院哲学”并无二致。前者反映的是现实的世界,后者是意识形态所对应的观念世界。当马克思反对抽象讨论精神世界如何与现实世界统一的问题时,实际上是用不同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语言,提出了意识形态批判这个相同的任务。对此,我们还将在下文证明,在“第1条”和“第2条”之后,马克思在推进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批判的时候同步开展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批判。在下文我们将看到,了解《提纲》的意识形态批判,对于理解《提纲》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出场方式和结合方式是非常必要的。

上述分析表明,以哲学思辨方式解读实践虽然触及到实践的某些属性或者功用,但是,由于忽视《提纲》实践的政治经济学涵义,则极易变为解释者借机发挥自己哲学玄想的由头。若要超越实践概念研究中的哲学思辨方式,就有必要回到《提纲》设定的市民社会批判语境,揭示实践概念所指向的现实内容。

2 实践二重性思想的叙述逻辑

如所周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与政治经济

学批判是一致的。当《提纲》运用实践观点展开市民社会分析时,同时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对于这个逻辑,我们将通过劳动二重性理论的“萌芽”形式——实践二重性予以辨析和阐释。

劳动二重性理论,马克思将它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它阐明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所有商品生产的最为关键之点,证明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既是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具体劳动,又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抽象劳动。同理,《提纲》在批判市民社会过程中所讨论的实践,既是将感性世界转变为一定的客体即“环境”的活动,也是将感性世界转变为一定的主体即“人类”“社会”的活动。这就是说,实践在市民社会中也具有二重性。简言之,实践的二重性就是指市民社会条件下实践作用于感性世界发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循着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逻辑,《提纲》实践二重性思想经历如下四个叙述阶段,依次出现在:“第1条”;“第3条”和“第4条”;“第6条”和“第7条”;“第9条”和“第10条”。

在“第1条”,马克思给出了实践最初的、也是最一般的规定性:“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感性的人的活动”^{[1]133}。这初步显露出实践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感性活动。之所以讲共产主义是感性活动革命性的命意所在,乃是因为马克思提及的革命对象不是别的社会,恰恰就是以“犹太人”商业活动为本质的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追求,决定了马克思不是泛泛谈论一般的感性活动,而是经由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自觉所把握到的现代社会实践。共产主义意义上的感性活动,为实践概念的后续发展确立逻辑起点。作为实践概念的起点,它的简单形态蕴含实践概念后续内容的规定性。第一,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犹太人以做生意方式与世界打交道,马克思以此为市民社会的象征。市民社会本质上是商业社会,每个人都是以平等的商品交换者的原子化身份,与他人和社会建立联系。马克思要批判的就是这个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确定实践反对现存世界的革命涵义,为后面提出共产主义理论做最初的铺垫。需要说明的是,《提纲》并没有直接使用共产主义概念来表达“革命”的性质,而使用了“人类”“社会”这样的加引号词语来阐述共产主义立场。从历史原因看,这恐怕缘于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概念的“借用”。在新世界观刚刚诞生的《提纲》中,把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痕迹的“人类”“社会”等概念依然保留了下来。不过,“人类”“社会”的内涵已完成向共产主义观念的转换。第三,对市民社会的

批判和对共产主义追求的标举,为批判形形色色哲学观念隐含的意识形态性质,确定了现实基础和革命立场。《提纲》已不再用认识论范式来讨论哲学,而是把包括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批判置于意识形态问题域中予以检视。

接下来,“第3条”和“第4条”在市民社会批判意义上探讨实践与感性世界之间的第一重基本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是通过人与环境的关系来分析的。马克思首先反对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134} 马克思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但是,一旦揭开第3条讨论“人”“环境”与教育之间关系的政治背景,市民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便赫然显现了。

1845年春天,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马克思遇到“教育”问题,即如何认识真正社会主义者运用教育手段改造市民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正是作为教育解决的“环境”问题而现身的。人与自然之间本来是相互统一的,但是私有制打破了这种统一状态。在私有制关系系统治下,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感性世界转变成私有财产,继而变成产生贫困现象的“环境”力量。马克思最初遭遇的“真正社会主义”,他们就是把教育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路径。特别是1844年6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发动起义后,德国社会围绕如何解决无产阶级“贫困”问题提出各种对策,包括“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内的众多改良派人士普遍认为,教育是让贫困者获得财产,改变纺织工人以及整个工人群体贫困处境的根本途径。这种试图以教育去改变无产阶级贫困状态,让财产的“非占有者”获得财产的主张,与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共产主义理论格格不入。

与抽象讨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不同,马克思不是一般化议论“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让思想走进现实社会关系。于是,人应当如何同感性世界建立联系,两者之间如何发生相互作用,就转换为如下问题:“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1]134} 于是,问题实际变成了实践的人如何对待自己与财产、私有制及整个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流派,他们只是直观到了现实对立,却不能提出走出现实矛盾境遇的可行道路。马克思认识到革命的感性活动之于上述问题的决定

性意义,主张通过实践消除感性世界“分裂”,解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天国与尘世之间的现实悖论。

在“第6条”和“第7条”中,马克思在市民社会批判层面分析了实践与感性世界的第二重基本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马克思指出,“在现实性上”,即在前述的“革命的实践”意义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35} 这里,个人与“社会”之间,或者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实践概念指涉的焦点。“社会”之所以作为言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费尔巴哈的影响不可忽视。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致费尔巴哈的信中说,“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2] 不过,此时作为共产主义革命家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社会”概念已经不是完全赞赏的态度。因为,费尔巴哈的“社会”概念毕竟受制于自然性,属于知性的、静态的思维。造成费尔巴哈“社会”观局限性的根源在于,他不是从实践来规定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实现的人的本质,没有越出市民社会视野来理解实际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尽管费尔巴哈声称“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3],但人的本质仍是非历史的范畴,没有跨出他寄身的资本主义社会藩篱。相对于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来讲,费尔巴哈的“社会”视野下的人性仍然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过,恰恰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曲折映照出市民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1]135} 这里讲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就是后来《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的商品化社会、货币化社会,它是资本力量统治一切的社会。“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415} 如此说来,实践在市民社会条件下作用于感性世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统治力量。

实践概念最后的叙述阶段是在“第9条”和“第10条”。在此阶段,通过对比市民社会立场与共产主义立场的根本对立,实践观念达到了共产主义立场的自觉。“第9条”说明市民社会立场只是满足于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具有默认资本主义秩序合理性的保守性,是站在市民社会立场上的资产阶级政治取向。“第10条”与“第9条”针锋相对,申明共产主义的革命立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36} 对于共产主义的表达,马克思依

然借用了费尔巴哈语言,以叠加使用“人类”“社会”范畴的方式表达超越自然性、抽象性的未来的社会关系,表明何种“社会”、何种“人类”关系才是共产主义社会。如前所述,之所以发生这种概念借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世界观创立之初,正是与人本学唯物主义之间出现概念的纠缠,并非难解之事。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概念的表面一致,而是透过辩证方法来领会这些哲学范畴,就不难发现它们已经转换为科学实践观的构成环节,获得了新的思想内涵。“第10条”的实践,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结束了市民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感性世界的疏离和抽象化统治问题,同时也是向“第1条”实践概念起点的回归,呈现出革命的感性活动的最具体、最完整含义。

至此,实践二重性思想在总体上完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性认识,并合理引出共产主义为市民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可见,马克思不是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抽象议论实践,而是立足市民社会中的大工业实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式,辩证地描述活生生的、总体性的实践。实践二重性勾连起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统一关系,为厘清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3 实践二重性思想的理论形态演变

《提纲》的实践二重性思想不仅决定着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整个思想体系的科学表达,而且还融入了马克思的后续思想发展,以多个命题形式一再证明自身的理论源头地位。择其要者,《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是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标志性体现。

在《形态》中,实践二重性思想主要通过现实的个人概念来表达。前述我们已经证明,《形态》与《提纲》都是在意识形态与“真正的实证科学”之间的对比中,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具有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理论叙事扎根现实生活过程,即“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实例来加以说明”。^{[1]153} 不难发现,“历史的实例”就是展开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和命题的论证。这里,实践二重性叙述逻辑转换为如下论题——现实的个人在感性世界中的生产再生产。以现实的个人在感性世界的物质生产为逻辑起点,整个叙述过程同样呈现出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结构。它分为两个阶段来展开分析论证:一是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在交往形式的第一重逻辑即

生产关系而存在,讨论的是面向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命生产再生产;二是现实的个人在交往形式的第二重逻辑及社会交往关系而存在,研究的是面向人与人之间关系下的生命生产再生产,即人格关系的生命生产再生产。通过两个阶段的连贯叙述,《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正走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处,一方面刻画出现实的个人的历史全貌,另一方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被共产主义社会取代的必然性。同时,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两个叙述阶段,都伴有对应的意识形态批判。生产关系阶段的意识形态批判,在交往关系阶段达到了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相统一的认识高度,最终实现了对全部精神生活的意识形态批判。

《共产党宣言》是标志科学社会主义问世的伟大作品,它同样延续着以实践二重性思想揭示现代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的思考方式。围绕所有制问题,《宣言》在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之际,阐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生产力的解放和个性的人的解放,得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性认识。由此,实现了以更加清晰、准确的范畴来描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在阐发科学社会主义之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同时提高到了崭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宣言》保持实践二重性思想将现实生活描述与意识形态批判相结合的理论叙事逻辑,在财产、个性、家庭、祖国和民族等观念上,以犀利的笔调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做出深刻的批判,生动阐释了与实践二重性思想相一致的意识形态批判逻辑:“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419-420}

及至《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将实践二重性当中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系统化植入商品经济的矛盾运动中理解,科学阐述了劳动二重性理论。他还通过对资本的生产、流通、分配研究,把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刻画得越来越具体,体现了对实践二重性逻辑细致和精到的运用。《资本论》不仅在起点处就把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确定为考察商品属性及其生产过程的基本方面,而且,在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逻辑的意义上,再一次提出这两种关系之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地位,即把它们解放看作人类解放的根本内容。“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指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笔者注)反映才会消失。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时,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4]在此基础上,《资本论》成为贯通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的总体性真理。《资本论》在透视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延续和发展了《提纲》新世界观的总体架构。

4 实践二重性思想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对实践二重性的分析,为市民社会批判开辟了全新理论视野,超越了《巴黎手稿》以带有人本学痕迹的异化劳动理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践二重性思想,为我们正确理解“新世界观”以及共产主义结论找到了深入现实的理论路径,从而首次建构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把握《提纲》以实践二重性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实践二重性思想及其应用,首次绘制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总体构架。《提纲》从实践的最一般规定性起步,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陈述方式,揭示出实践的二重性,并达到现代实践即活生生的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最终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立场自觉。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式完整地揭示了现代实践的本质、结构和趋势,它既是共产主义的科学表达,又同时批判市民社会关系及其意识形态逻辑。这反映出《提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以往,哲学思辨方式主导下的实践理解,虽然也具备文献上的支持,但确实离开上述三个方面所确立的新世界观总体构架,将实践看作脱离现代社会总体的纯粹思想范畴,最终难免落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实践二重性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能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科学验证。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脱离历史事实的纯粹思辨,它需要结合生动的历史来证实自身。《提纲》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次完成了这种科学的论证。马克思谈论实践,总是不忘批判它在市民社会当中颠倒反映,即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提纲》始终存在一条对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关系理解的问题线索,它随着问题研究的层层推进,从而全面、立体地展现出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以及社会意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提纲》以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批判和共产主义自我认识的结合抵达现实生活深处,并通过实践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的阐释,全面勾勒出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同时,通过分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

生作用的机制,深刻洞察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颠倒关系。可见,《提纲》已然在实质意义上提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如实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发生机制,我们也就获得了关于全部社会生活的理论认识,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最初的体系化表达。

第三,实践二重性思想有助于克服以抽象的普遍性观念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近年来,有人通过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来“压低”以生产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也有人怀着扩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的愿望提出所谓的“大唯物史观”。从方法论看,这两种观点有着相同的错误,都是脱离《提纲》语境,丢掉实践概念指向的市民社会批判,抽象议论马克思关于环境与人关系论述,泛化这对矛盾的适用范围。实际上,“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大唯物史观”提炼的抽象普遍性仍然属于纯粹哲学思辨,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走入现代社会的深处,反倒容易浮于表面,丢掉本应细致思考的现实生活中处于交织状态的“中介”关系。我们应当像马克思那样,从实践二重性出发,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导入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努力对现实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做出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批判性理解。

第四,实践二重性思想,证明了《提纲》还是未具名的共产主义宣言书。尽管全文没有直接提及共产主义,但是,联系《提纲》产生的历史和思想实情,能够合理地推断出实践概念所指称的“新唯物主义”,就是力图达到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自我认识,实则就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论说。对于这一认识的科学表达正是马克思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事业。《提纲》以过渡性范畴和独特结构论证共产主义追求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本质上是以人格关系的“社会”性、“人类”性之真正实现为目标的,与物化关系系统治下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截然对立。

第五,实践二重性思想,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新阶段。与《巴黎手稿》相比,《提纲》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批判走向更高阶段。首先,此时放弃了“异化”话语,即不再预悬理想社会、理想人性作为批判尺度,更加彻底的走入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批判。其次,支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背景增添了意识形态批判和共产主义的新认识,为全面透视市民社会的本质和运行规律提供了科学框架。再次,基于实践对市民社会的两个方面——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批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确定了关键的思想要素。这两重关

系,此后不仅体现在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之中,而且,还作为超越商品关系逻辑统治和衡量未来理想社会的评判测度,即确立“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之间、人与人之间实现和谐统一成为社会发展标尺。

总之,若要如实呈现《提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理应告别以片面的哲学思辨方式理解实践。以实践二重性透视市民社会本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能准确认识《提纲》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总体构架,进而为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演进轨迹提供新视点。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

[3]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5.

[4] 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7.

A Probe in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Outline of Feuerbach

CAI Qian, ZHANG Yongqing

(College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Outline of Feuerbach has a critical logic of political economy. Practice is not only a concept of philosophy, but also a concept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duality of practice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which occurs in the perceptual worl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ivil society. Based on the duality of practice, Marx double criticized the roots of the civil society that "the world is dualized": on the one hand, it criticized the upside-down of the emotional worl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criticized the abstract do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With the duality of practice, Marx reveale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perceptual world caused by the civil society in both the object and subject, and achieve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st stance in practice. In response to the dual narrative logic of practice, Marx simultaneously launched a critique of bourgeois ideology. In the form of "germination", "Outline" first expounds the theory of labor duality of "the hub of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economy", advances the previous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a level consistent with the "new worldview", and establishes a broad theoretical vision for the subsequent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whole Marxist ideological system.

Keywords: civil society; practice duality;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deology; Marxism

[责任编辑:裴 琴]